

# 武德钱文读法考辨

赵云耕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唐武德四年始铸新币,“开元通宝”为官方正统读法,“开通元宝”虽为民间误读之流俗,然影响久远,故高宗铸旋读之“乾封泉宝”,叛军铸币、地方铸币均袭此。后肃宗虽铸“乾元重宝”以拨乱反正,然两说并存,乃至并立,遂形成后世铸币直读之通宝和旋读之元宝两大基本系统。

**关键词:**钱币;武德钱文;开元通宝;直读;旋读;《中国古钱币》

**中图分类号:**K87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2-0081-05

初唐武德钱文读法,文献记载有直读、旋读两说,研究者亦有两说并立之论,莫衷一是。近日备课,读唐石父先生主编“国家文物局主持、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之《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一书附录之唐先生大作《武德钱文研究》一文,颇有心得,然看法迥异。唐先生此文认为武德钱文应读如“开通元宝”,然考据引证多有疏漏,结论亦难以令人信服,遂结合历年授课积累之经验,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粗浅认识,以就正于方家。

## 1. 从正史文献记载来看,武德钱文应该是直读无疑

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文研究》第一节《序言》,开宗明义,即断定“由于史官不懂钱文读法之重要性,以及史官编撰《旧唐书》时上距武德行新钱,已迟三百年,唐人读法时人多不了解,史官遂将旋读、顺读(案,即直读)都载入史册,读史者无所足从后世学者,每苦文献无征”,在文章第二部分《欧阳询制词情况及读法分歧》中,又说:“读法分歧,若发生于纂史之时,自与唐人读法无关,更不能据以证明唐人必有两读。设发生于纂史之前,略早于五代则可,绝不早于唐玄宗改元开元之时。”<sup>[1]64</sup>唐先生此论,未免过于武断。

考之《新唐书》和《旧唐书》,所载唐代官方所铸三种钱币“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除第二种因袭民间流俗,钱文读法设计有误之外,均为直读。而且,正史记载恰恰表明“乾元重宝”是对“乾封泉宝”的拨乱反正。

《新唐书·食货志》载:“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旧唐书·食货志》亦载:“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迴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及铸新钱,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寻寤钱文之误,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

以上正史引文明白无误地说明武德钱文按照钱币本身直读“开元通宝”为官方正统,而旋读“开通元宝”则是民间流俗误读,但因“其义亦通”,于是两说并存,直到时隔54年之后铸造“乾封泉宝”新钱,却没有按照官方正统设计,而是按照对开元通宝的误读改新钱为旋读,即按照先上、次左、次下、至右的回环顺序来读,可见民间

收稿日期:2012-12-02

作者简介:赵云耕(1971-),男,河北顺平人,保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史。

误读流布之广,影响之大。不过,流俗毕竟是流俗,上文提及“寻寤钱文之误”,足可见正史对“乾封泉宝”钱文之定性。

《新唐书·食货志》又载:“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奏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掺用,以一当十。”乾元是唐肃宗年号,新铸币“乾元重宝”,直读,正和上引《旧唐书·食货志》所载“乃同流俗”“钱文之误”逻辑相合,均明白无误地以“开元通宝”直读为正统。

或曰,新、旧两《唐书》虽为官修正史,《旧唐书》系五代后晋刘昫所撰,而《新唐书》则为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编纂,两书著者皆为唐代之后的五代人和宋人,难免误记或以讹传讹,远不如唐代时人记述可靠。于是,持“旋读”论的研究者,首引李林甫等奉敕作注、唐人所著《大唐六典》(旧题唐玄宗御撰)卷二十二注:“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钱,更铸‘开通元宝’钱”;又引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之记载:“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再引唐人刘餗撰写的《隋唐嘉话》,其在“卷下”:“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欧阳率更所书也”;更引唐人胡璩所撰《谭宾录》:“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通元宝’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询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掐一甲迹,因是有之”,以此四条唐代时人所撰写的关于武德钱文的记述,作为支撑武德钱文旋读“开通元宝”之铁证。

上述引文看似繁富确凿,但仔细推敲,却并无多少说服力。首先,这四条所谓重要论据的作者,都生活在武德钱文直读、旋读两说“并存”,乃至“并立”的时代,(李林甫、刘餗生活在玄宗时代;杜佑主要活动在德宗、顺宗、宪宗时期,胡璩主要活动在武宗时期),在当时背景下出现这样的理解和记述,无可厚非。武德钱文直读、旋读由最初的被误读而导致两说并存,直到并立,甚至流俗之说在“乾封泉宝”铸行之后一度占了上风,以至于时人撰写的上述四种文献均误以武德钱文为旋读,再正常不过。设若有人据此否定《旧唐书》和《新唐书》等正史关于武德钱文直读之记载,则是值得商榷的。彭信威先生就曾充分肯定新旧《唐书》都称“开元通宝”的有关记载,他说,“乾封二年五月的《用旧钱诏》中,明明说是‘开元泉货’和‘开元通宝’”(《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财利》)。裴耀卿、李林甫和萧奂等也说过“钱者通宝……”的话(《通典·食货一零》),彭先生明确指出,《唐六典》“虽然时代早于《旧唐书》,但《旧唐书》并非杜撰,乃根据唐人吴兢、韦述等人的原著编写。吴兢的《唐书》成于开元中,各点交代得很清楚。后出书不附和前书,必有原因。《唐六典》注的名称可能是由于抄刻之误,也可能因民间本有两种读法,注者想要强调当时年号不是抄袭钱名,故意采用的另一种读法”<sup>[230]</sup>。

由此,前文所引唐先生的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 2. 从唐代经济制度渊源来看,武德钱文应是直读

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文研究》第三节《历史背景》,紧扣武德钱文文意本源做了认真考证,但却完全忽略了从汉魏六朝以来四字钱文读法之传统,以及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渊源背景之下,唐初铸币必须因循之北朝正统。

考诸汉魏六朝面文四字的钱币,绝大多数都是直读。如新莽“大泉五十”、“小泉值一”等所谓“六泉”,三国时期蜀汉“直百五铢”、孙吴“大泉五百”、“太平百钱”、“世平百钱”、“定平一百”,十六国前凉“凉造新泉”,均为直读。此间只有孙吴“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十六国胡夏“大夏真兴”四种极其少见稀见的非主流钱币是旋读。可见,自新莽以降直到南北朝期间四百余年铸行的面文四字钱币,钱文直读已经形成传统。

了解汉魏以来四字钱文直读传统之后,研究武德钱文读法,还必须结合隋唐政治经济制度渊源,做进一步考察。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sup>[3]</sup>。阎步克教授也曾明确地说,“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故隋唐制度在继承和发展北朝、南朝文化的同时,其渊源更侧重于北朝系统,尤其是西魏、北周,辅之以南朝梁、陈,其钱币铸造制度亦不外如是。

南北朝钱币铸造,在沿袭汉魏以降的直读传统基础上,形成隋唐承袭之制度正统。北朝钱币面文四字者如北魏孝文帝“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五铢”,北齐文宣帝“常平五铢”,南朝钱币面文四字者如梁武帝“太清丰乐”,陈宣帝“太货六铢”,也均为直读;特别是和“开元通宝”钱文文意更为紧密的北周武帝铸造的“北周三品”之“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明白无误是直读。既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主要承袭北朝,辅之以南朝,其建国之始铸造钱币,断无违背汉魏六朝以来铸币传统特别是北朝铸币正统,无端把开国新铸币钱文由直读改为旋

读之可能。

3. 从钱文文意承袭(“北周三品”)来看,武德钱文应是直读

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文研究》第四节《欧阳词意渊源》,对武德钱文文意沿袭“北周三品”钱文做了精辟而深入的考证,但却未能结合铸币顺序考察“北周三品”钱文文意演变之深意,却又先入为主地论证了“元宝”之由来。在文中,唐先生这样说:“元宝二字连属成文,也有其渊源。例如,王莽的大泉、大布,三国吴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石赵的丰货,陈的太货六铢等钱的文意,就是它的本源。”<sup>[164]</sup>“大泉、大布、丰货、太货都可理解做大钱的意思,大致不错。元宝的元字,也是大的意思……,元宝连文,以喻其钱之贵重,为国家大宝,和上述各种钱文文意,是相互一致的。”<sup>[164]</sup>唐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把“北周三品”概括为“开通”,把前朝大泉、大布、丰货、太货概括为“元宝”,两相结合,武德钱文文意即成定局。但是唐先生忘记了,此节文字中,他明确指出武德钱币“铸行的是小平钱,不是大钱”<sup>[164]</sup>,既然是小平而非大钱,何以突兀地称“元宝”?又何以与虚值大钱“北周三品”钱文文意结合?

考诸文献,武德钱文之“通宝”二字,上承北朝确凿无疑。《魏书·食货志》载:“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贾于京邑,不行于天下。”这里的“通”字,虽然没有在当时钱文上体现,但此处“通货”就是“流通的宝货”之意,已有后世钱文“通(宝)”之文意。及至北周三品铸行,钱文文意完全脱离量名,更是以“流通”为主观愿望的直接体现:北周“布泉”,意思是“流布之钱(泉)币”,其中已然隐含“通”(流布、流通)“宝”(泉币,钱币,货币,宝货)之意;“五行大布”,意为“在五行中大行流布、流通”,也就是扩大范围之流通;“永通万国”,意谓“永远流通于万国”,其文意则更为直白明了、气度恢弘。不仅如此,“永通万国”钱文第一次把“通”字铸造在钱文之上,这就为武德钱文承袭前朝提供了确凿的依据。

而且,比较“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两种面文四字的钱币,“五行”对应“万国”,指的是期望中的流通范围;“大布”和“永通”相对,是对钱币流通“程度”(“大”和“永”)的期望;再对照“布泉”,北周三品的钱文文意演变应如是:“流布之泉(钱)币”——“在五行中大行流布、流通”——“永远流通于万国”,三品钱文之综合文意就是:“永远流通于(五行)万国中的泉币”,其核心词汇简而言之,就是“通宝”。

由是,李唐之初武德四年始铸新币,官方正读“开元通宝”无可置辩。唐先生文章未能深入把握“北周三品”钱文作为武德铸币之正统之深意,却又先入为主地把“元宝”一词作为北周钱文文意的发展而加以论证之由来,从而导致了不应有的逻辑混乱,其结论错误可想而知。

4. 从唐代其他铸币钱文演变看,武德钱文应该是直读

唐代除正史所载官铸“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三种钱币之外,尚有“安史之乱”首领史思明所铸“得一元宝”、“顺天元宝”,以及安西都护府地方所铸“建中通宝”、“大历元宝”,此外尚有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铸而未行的“咸通元宝”,总共8种,可分四类:前三种,均为中央官铸,“得一元宝”、“顺天元宝”为叛军所铸,“建中通宝”、“大历元宝”为地方官铸,最后一种虽为地方监铸,但曾进呈皇帝,可看作准中央官铸。

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文研究》第五节《唐人读开通元宝之证》,概括“除开通元宝外,唐钱七种,其中六种皆旋读,唯乾元重宝一种例外,足证唐代读法,是用旋读为主的”<sup>[164]</sup>。唐先生这段话,未免太武断了,他所论及的这六种唐钱中,“咸通元宝”就明白无误地是直读而非旋读,但唐先生文中的“唐代钱文读法表”却把“咸通元宝”误认为旋读,可能唐先生没有看到过实物或照片。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被唐石父先生误以为旋读,从而完全忽略的“唐泉第一珍”的“咸通元宝”。南宋洪遵《泉志》载:“右咸通钱,旧谱曰,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元宝’,寻有敕停废不行”。尽管此钱未见正史记载,但却曾经进呈唐懿宗,尽管未能批准流通,但毕竟可算是“乾元重宝”之后的又一次官方行为,尽管“咸通”钱文有因袭“开通”之嫌疑,但毕竟此钱实物确系直读,这就足以证明唐代官方钱文直读为正统,也证明武德钱文确系直读无疑<sup>[4]</sup>。

上文可知,旋读的唐钱只有五种,其中“建中”虽系旋读,但却称“通宝”而非“元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除开通元宝外,这七种唐钱所沿袭的武德钱文,直读“开元通宝”为官方正读,而旋读“开通元宝”则是民间流俗误读。因此,“乾封泉宝”沿袭流俗误读,“乾元重宝”则拨乱反正。但叛军首领史思明所铸“得一元宝”、“顺天元宝”以及安西都护府地方所铸“大历元宝”宝文继续沿袭民间流俗,“建中通宝”则宝文因袭正

统称“通宝”,但宝文顺序却依照流俗为旋读;“咸通玄宝”又据官方正统为直读,宝文却因袭流俗为“咸通”。以上各钱情况可知,唐代武德钱文两种读法并存所造成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因为误读而造成两说并存,乃至并立,逐形成后世铸币直读之“通宝”和旋读之“元宝”两大基本系统。

唐先生在此节文中,曾论证“乾封泉宝”包含“开通元宝”文意,说“开通”用“流通之意”即“泉”,“元宝”简缩为“宝”,乾封泉宝系“乾封”年号加“泉宝”而成。这恰恰是因为时人误读“开通元宝”所造成的结果,如唐先生此论成立,则武德钱文所含政治意义完全丧失,明白了这个大前提,一切都迎刃而解。

#### 5. 从日本皇朝十二钱钱文无“元宝”看,武德钱文应该是直读

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文研究》第五节《唐人读开通元宝之证》第三部分“日本钱文之证”,称“日本钱币,是受唐代钱币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并铸造的。确切地说,是受开通元宝的直接影响而铸造的。传世日本皇朝十二钱,都是旋读的,无一例外”<sup>[1646]</sup>。

问题的关键在于传世日本皇朝十二钱,尽管都是旋读,但无一例外,没有一种钱文称作“元宝”,与此相反的是,却有二种钱文为“通宝”,特别是其中的铸于唐乾元三年的“万年通宝”。彭信威先生早就发现这一问题,他指出,日本“皇朝十二钱都是环读。这对于开元钱环读的说法,的确是一个有力的理由,因为日本和同开宝是仿开元钱的,而且时代相同。不过他们对开元钱的读法,大概是受当时中国民间读法的影响,其实那十二钱中,就有两枚通宝,没有一枚元宝”<sup>[2]309-310</sup>。

既然日本钱币是“受唐代钱币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并铸造的”,那为何一种称作“元宝”的钱币都没有?显然,日本钱币尽管深受唐代钱币影响,但因当时直读、旋读两说并存,于是才出现上述现象,这绝非偶然。考之日本皇朝十二钱,第一种“和同开宝”,铸行于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恰是“开通元宝”流俗滥觞之时,因而“和同开宝”因袭流俗,旋读,合乎情理。第二种钱币“万年通宝”始铸于武德钱文“拨乱反正”之后的乾元三年,此时唐朝政府铸行“乾元重宝”,直读,朝野上下必定会重新审视武德钱文读法。日本“万年通宝”铸造设计虽为旋读,但既然称“通宝”,可见武德钱文“直读”在乾元重宝“拨乱反正”之后,其影响力已经远播日本,至少在钱文文意上,“通宝”说一度占了上风,不然也不会在“万年通宝”铸行之后20余年,唐朝西北就出现了“建中通宝”。

#### 6. 从近年来对王梵志生平诗文研究看,武德钱文应该是直读

唐石父先生《武德钱文研究》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唐初诗人王梵志涉及武德钱文的诗。其第五节《唐人读开通元宝之证》第一部分“唐初诗人王梵志诗之证”,引唐代诗人王梵志《奉使亲监铸》诗,“奉使亲监铸,改故造新光。开通万里达,元宝出青黄。本姓使流传,涓涓亿兆阳。无心念贫事,□□□□□。有时见即喜,贵重刷爷娘。唯须家中足,时时对孟尝。”并推断:“开通、元宝是分别连属成词的,并非开元、通宝各自成辞。适足以否定顺读说。又云“‘开通万里达’句,证明武德钱文是立足于流通之意的。”<sup>[1648]</sup>在《武德钱文研究》第七节《小结》部分,唐先生更是肯定地说:“如今获得王梵志的《奉使亲监铸》诗,就彻底否定了顺读说,并使《旧唐书》传播的误说,如顺读及回环读之其义亦通等,都可置之勿论了。”唐先生还十分自信地说,“王梵志诗,世无传本。自敦煌石室发现王梵志诗后,始为世重。1983年中华书局据张锡厚先生校辑本,题作《王梵志诗校辑》,排印行世。所录《奉使亲监铸》一诗,乃当时目击‘废五铢,行新钱’之人所咏。本可据以订正《旧唐书》之误,廓清读法之分歧,揭出唐人读武德新钱,是用旋读的史实。由于张先生未曾接触武德钱文读法种种问题,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引《旧唐书·食货志》之文,为诗作注,是以后世误解,反转过来,以目击者之诗,遂使冠履倒置,积弊难得订正了。王梵志诗一首,对多年来研究所得唐人读武德钱文是用旋读的结论,无疑是一个正面的重要证据,使这个结论得到肯定。”<sup>[1655-656]</sup>

很显然,这是唐石父先生所有证据中最为关键、重要的一个。可想而知,武德钱文最新铸造之际,奉使监铸之人所写的诗词,如有对钱文读法的描述,那一定是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但是,“王梵志身世由于记载其生平材料的稀少和不可确证”<sup>[9]</sup>,十分模糊朦胧,他所写诗词并无确切编年考证,以这样的诗来证史,难免会有一定风险。随着近年来对王梵志生平诗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奉使亲监铸》一诗之确切写作年代,也大体有了眉目。研究者根据王梵志身世,明确指出王梵志不可能在武德四年由科举或世袭而做官,甚至不可能出生于公元617年之前,由此断定“王梵志不可能在621年任铸钱监”<sup>[9]</sup>,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研究者并进一步指出,唐代

初期有两次改铸开元通宝,一次是唐初武德四年,第二次是在高宗乾封二年“旧钱并废”,重新铸造开元通宝。《旧唐书·食货志》载:“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宝钱,直开元十,周年以后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乾封钱贮。”《唐会要》载:“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铸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乾封泉宝铸行后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并用。未及一年,物价高涨,商贾不兴,民不以为便,遂下诏废之,共诏曰:“泉市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研究者指出:“在此之前,之所以没有人将这首诗与第二次钱币改铸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过于注意‘改故造新’,在‘新’字上大做文章,认为‘开元通宝’钱只有第一次出现才算‘新’,从而忽视了只存在一年多时间的‘乾封泉宝’钱。其实,‘改故造新’指的就是钱币的改铸。废‘乾封泉宝’钱,铸‘开元通宝’钱,这不是‘改故造新’又是什么呢?”<sup>[5]</sup>以王梵志之生平事迹,《奉使亲监铸》作于唐代第二次改铸开元通宝钱,即“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或稍后两年”<sup>[5]</sup>最为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武德钱文读法,诚如著名货币史家彭信威先生在其巨著《中国货币史》中明确指出那样,“开元钱应当直读,即先上下,后左右”<sup>[2][293]</sup>,这看似简单但却有着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结论,才是武德钱文最具权威性之正解。

#### 参考文献:

- [1]唐石父.中国古钱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3]陈寅恪.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
- [4]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咸通玄宝考[J].中国钱币,2011(3):45-54.
- [5]徐俊波.王梵志生活年代考[J].敦煌研究,2001(4):145-151,183.

## Research on Reading of Wude Currency

Zhao Yungeng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ang started to circulate new currency in Wude four years. Although “kaiyuantongbao” was the official orthodoxy, “opened ingot” was a popular folk misreading. The impact lasted for a along time, when Gaozong invented spin reading “Qian Feng Quan Bao” coins, the rebels and locals did so. Later, although Suzong cast “Qianyuan treasures” to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but two opinions coexist, and side by side, thus forming two basic systems of direct reading and spin reading.

**Key words:** currency; Wude currency; Kaiyuantongbao; direct reading; spin reading; Chinese Ancient Coins

(责任编辑 崔福林)